

再谈杜甫“预测诗”

周 睿 舒 坦

（摘 要） 本文关注杜甫对国家未来命运、军事力量权衡的预测性诗作，通过对这类带有“预言”性质的诗作的文化阐释，实现对杜诗“去神秘化”的认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杜诗的客观认识，正确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杜甫 预测诗 谶 文化阐释

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4期的拙文《杜甫诗谶初探》对部分被后世解诗者释为“诗谶”的杜诗文本进行了类型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文化阐释，从神秘主义和文学结合的产物的视角，解读杜甫谶言诗产生的原因。然而，该文却并未涉及到杜甫对国家未来命运、军事力量权衡的预测性诗作，而这类诗作，也偶被解诗者目为“谶也”。本文拟在前文基础上再探杜甫的这类“预测诗”。

从某种程度上说，“预测诗”也是一种“谶”。《释名》曰“谶者，纤（纖）也，其义纤微也。”后世文儒进一步加以阐发“谶，预言王者之兴亡也。”^①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以神学或超自然的观念对诗的解释，彰显出神秘文化主义对

中国古代文学的潜在影响。对之加以批判性的历史理性主义分析，或可发掘掩盖在传统的神学历史观和社会观面纱下的人文主义思潮精神。

杜甫是一位对于时政相当敏感并且带有预见性的诗人。怀着对国家的深切关怀，他对于时政的变化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并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杜甫这些对国家未来命运、军事力量权衡的预测性诗作，就带着浓厚的被解诗者“神秘化”的意味。试看《收京三首》其三：

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

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

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

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

《杜诗详注》卷五注云“三章，收京而忧事后……。但恐回纥恃功邀赏，诸将僭

作者：周睿，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舒坦，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400715。

奢无度，故又为之虑曰：今京师收复，此万方送喜之时，无乃圣躬焦劳之渐乎。公盖忧鹵横臣骄，将成蹂躪跋扈之势，厥后边方猾夏，藩镇专权，果如所虑，惜当时不能见及此耳。”^②据《旧唐书·肃宗纪》载：“（九月）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癸卯，广平王收西京。……（冬十月）壬戌，广平王入东京，陈兵天津桥南，士庶欢呼路侧。”^③安史之乱，二都沦陷，黎民“日夜更望官军至”，等待两年，方得收复。按说收京之喜令人大快，但杜甫凭借敏锐的政治触觉，一方面忧患“鹵横”至于“边方猾夏”，预感到当年助唐军一臂之力的回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将邀功甚乃发难。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载，当时在灵武匆匆即位的肃宗李亨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急于彰显其武功军威，复两京迎上皇，故与回纥签下秘密军事协议，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④，而回纥拿下长安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兑现承诺，广平王李俶“拜于马前”，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回纥方才没有立即在西京展开大规模的掠夺；收复洛阳之后，回纥“意犹未厌”，史书称“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并“约每年送绢二万疋”^⑤，回纥从此成为边关大患，这印证了杜甫的担忧。另一方面，杜甫担心“臣骄”导致“藩镇专权”。肃宗政治大局观狭隘、目光短浅，不仅格外倚重宦官，埋下了唐代阉党分取皇权的祸种，而且继续姑息藩镇尾大不掉的威胁。乾元元年，肃宗同意高丽人李怀玉举荐自己的姑

表兄弟侯希逸为节度副使，《资治通鉴》评价云“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⑥杜甫曾于肃宗朝拜左拾遗，为尽谏官职守而触怒肃宗，在一段“伴君如伴虎”的经历后，或能感知肃宗“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的性格缺陷。杜甫在诗中表现出对未来事态发展的担忧，并形成准确的预测，“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二句，可谓不虚言也。杨伦《杜诗镜铨》称“公之有远识如此，而语义仍含蓄不露。”^⑦杜甫另一首《收京》云：

复道收京邑，兼闻杀犬戎。
衣冠却扈从，车驾已还宫。
克复诚如此，安危在数公。
莫令回首地，恸哭起悲风。

《杜诗详注》卷十三注云“上四收京而喜，下乃事后之忧。两次收京，故云复道。子仪力战能杀吐蕃也。《杜臆》：衣冠自然扈从，用一却字，有不满诸臣意。平日谄谀依阿，有变则奔亡坐视，及至收京，却来扈从，而车驾则已还宫矣，此辈何益成败之数耶。克复之功，全在数公，朝廷当信任以图久安，无使京华之地，再哭乱离也。未几，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入寇，京师震骇，公之先见明矣。”^⑧两京收复后两年，东都洛阳再陷敌手，生灵涂炭，直至广德元年方再复。杜甫在诗中提醒皇上，要信赖如李光弼、郭子仪这样的在光复大业中效死卫国的大将，警惕那些墙头草般见风使舵的小人。不幸的是，代宗正是任命心术不正的仆固怀恩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使得事态的发展正如杜甫所担忧的那样。仆固怀恩曾经一度依附鱼朝恩，瞎乱指挥李光弼收复东都而大败，后“恃功骄蹇”，刚愎自用，同时工于政术，唯恐“贼平宠衰”，阳奉阴违，依仗

回纥可汗是其女婿，勾结外敌，有“外交回纥”的狼子野心，以至于“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憚”，无人敢问，甚至“犯含光门，突入鸿胪寺，门司不敢遏”^⑨，在京城肆行如入无人之境，仆固怀恩对回纥的纵容达到如此地步。在其为政期间，西方大患吐蕃大举进犯唐土，攻破大震关之后，尽取河陇之地，一路东进，位高权重的宦官程元振，一直压制军情不报，吐蕃军队兵临城下已至咸阳，他还“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将”，拒绝了郭子仪增兵的要求，《旧唐书·裴度传》云“臣读国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轶，直犯都城。代宗不知，盖被程元振蒙蔽，几危社稷。”极为可厌。很快，长安沦落敌手，代宗仓惶出逃，“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间舍，长安中萧然一空”^⑩。而官除中书令的仆固怀恩之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史称其“既不为朝廷所用，遂与河东都将李竭诚潜谋取太原”，先是谋反，后竟然扮演“汉奸”，“引回纥、吐蕃十万众将入寇，京师震骇”，连其母都要“提刀逐之”，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在这首诗当中，杜甫提醒在上位者注意可能隐藏的危机，避免朝廷信任佞臣、京城再逢厄运的悲剧，惜弦断无人听。

杜甫身为文士，但对于兵机却有极敏感的洞悉力，能够提出自己的军事见解。因其时不为人所重，故警示竟不得时人知，千百年后为人所察，误入诗谶一格。《剑门》：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
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
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

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
三皇五帝前，鸡犬各相放。
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
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
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
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
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

《杜诗详注》卷九注云“末段言其形胜，恐蜀人罹于战争也。并吞者王，如汉光武是也。割据者霸，如公孙述是也。从古多因叠嶂凭险，恐此复有其事，故临风而生怅。”^⑪蜀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李太白《蜀道难》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岑参《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帥判官》云“刘氏昔颠覆，公孙曾败绩。始知德不修，恃此险何益”，皆暗示割据一方的军阀或成国家安全之大患。乾元二年腊月，正值华夏满目疮痍之际，是时蜀中稍显治宁，但是杜甫眼见天险若此，临风惆怅，深知一旦有人据此作乱，剑门天险将助纣为虐，故大声疾呼“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诸将》五首其五）杜甫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据《旧唐书》、《资治通鉴》史料，杜甫至蜀五年之间，蜀地数乱：上元二年三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叛乱并破遂州，两月后在绵州覆灭；宝应元年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谋反，重兵把守军机要道，力拒严武赴任，二十六天后叛乱遂平；永泰元年冬十月，严武的继任者剑南节度使郭英义为西川兵马使崔旰所杀，崔旰据成都，邛州柏茂林、泸州杨子琳、剑南李昌巖趁势起兵征讨，蜀中再乱。《旧唐书·杜甫传》称“是岁（永

泰元年)，崔宁杀英义，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⑫可见，蜀中大乱是迫使杜甫离开西蜀的直接原因之一。也就是在这年，杜甫顺江而下，滞留云安，有《怀锦水居止二首》诗，其一曰：

军旅西征僻，风尘战伐多。

犹闻蜀父老，不忘舜讴歌。

天险终难立，柴门岂重过。

朝朝巫峡水，远逗锦江波。

《杜诗详注》卷十四引《杜臆》：“天险，即所谓‘西蜀地形天下险’，曰‘终难立’，已知蜀乱难平矣。”^⑬杜甫对野心勃勃的叛乱军阀早有防备，已然感受到其咄咄逼人的杀戮之气，故远走避祸。再如，《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诗有“回首黎元病，争权将帅诛”句，仇兆鳌注曰“争权将帅，如成都之郭英义、崔旰，互相杀伐，襄阳之来瑱、裴茂，谋夺节镇，皆是。未及，湖南有臧玠之乱，公之明炳几先如此。”^⑭杜甫对军阀争斗的本质洞若观火。故言之，与其说是“谶”，不如说杜甫作“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的沉痛之语，一方面基于他不忍乱离的民胞物与思想和忠君爱国、主张一统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源自其对于时局的准确预测和判断。《杜诗详注》总结曰：“按公《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知天宝之将乱也。《悲青坂》诗‘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知收京在次年也。《收京》诗：‘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知回纥生衅，藩镇跋扈也。《秦州》诗‘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知吐蕃寇边，不能安枕也。此诗云‘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知蜀必有事，而深忧远虑也。未

几，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杨子琳辈果据险为乱。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见其经世之才矣。”^⑮极为精当。

从对杜甫的上述“预测诗”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其被打上“谶”烙印的作品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反映出杜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和君臣关系的关切与焦虑。杜甫对于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和朝纲紊乱的批判意识皆源自儒家的仁政思想，其倡导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儒家的德政。杜甫的这些“预测诗”不过是在仁政和德政思想指导下对时局的准确把握和精确预测。而中国自古有灾异祲祥的天命观念，如《礼记·中庸》云：“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董仲舒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以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为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⑯有“诗谶”之嫌的“预测诗”成为附会天意以索解人事的重要途径，诗性语言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意义，成为了表达天意的工具。实质上这类预测诗，其实是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的延续，其重要特点是将人事与天命、自然现象结合起来，认为人类的活动会导致自然界的某些变化，天之所言，必有所预兆传达到人间，而杜甫“似乎”能够捕捉到这些微妙的讯息，在诗中加以表达。把这部分杜诗视为预测之作，是对杜甫诗圣、杜诗诗史地位的人为拔高，是将杜诗“神秘化”、“神圣化”。

除了神秘化杜诗之外，蔚为大观的唐诗中即有不少诗作被后代解诗者视为“预测诗”或“谶言诗”，这种“预测性”唐诗，多为野史（亦不乏正史）所

载，如《唐诗纪事》、《本事诗》等，素来为后世文人所津津乐道，成为虚构文学的重要题材。比如，吴中四士之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有“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句，因其充满人生无常的凄惶感而千古流传，其自感不祥：“死生有命，岂由此虚言乎！”民间野史称次年刘希夷就因此诗的“版权纠纷”而痛遭其舅宋之问之毒手。崔曙的试帖之作《明堂火珠》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为其赢得开元二十六年进士及第，然而崔曙第二年即撒手人寰，遗孤独女名唤“星星”。宪宗朝宰相武元衡在被节度使李师道派出的杀手暗杀前夜，曾作诗《夏夜作》云“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甚为不祥。薛涛年少时应对其父诗句“庭中一古桐，耸干入云中”——“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令其父“愀然久已”；李季兰幼时咏蔷薇“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其父断言“此必为失行妇也。”皆似乎隐约呈现出二女终将沦落风尘之先兆。诸如此类，都可归为臭名昭著的“预测诗”，即“诗谶”。这些预测诗有其形成和传播的特定文化环境，多半与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谶纬学因其怪诞要眇的神学理论体系而常常受到有意冷落而声名狼藉。然而，预测性谶诗作为唐诗研究体系中的一部分，剥除其神秘主义光环之后的文本多是可解的，应该得到文学文本上的

正视和文化意义上的理解。

要言之，诗谶本身是消极的、落后的、唯心色彩浓重的封建宿命论糟粕，对其批判和扬弃依然是应坚持的立场——这是对待这种文化现象的基本态度。通过对杜诗的两度解读管窥预测类唐诗，可见这类诗作要么是源自其对时局的精准把握后做出的判断，要么纯属巧合，并无过多的神秘主义色彩，决非作者们有意将天意、神命、冥定的预言赋予诗的形式，通过诗所做出的对人事的祸福吉凶的先兆性预言。了解谶化唐诗的文化心理机制，对于当下应对社会所呈现出的预兆的恐慌心理，或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项目批准号：10XJC751010）

注释：

- ①吕向注左思《魏都赋》“藏气谶纬，闕象竹帛”句，《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
- ②⑧⑪⑬⑭⑮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03年。
- ③⑫刘昉《旧唐书》，中华书局1997年。
- ④⑤⑥⑨⑩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2年。
- ⑦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⑯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年。

责任编辑 李霞锋